

搜红色文化物证 集时代精神财富 ——试论革命文物内涵挖掘与潜能释放

Search for Red Cultural Material Evidence Collect the Spiritual Wealth of the Times:
On the Connotation Excavation and the Potential Release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黄雪寅

Huang Xueyin

(首都博物馆, 北京, 100045)

(Capital Museum, Beijing, 100045)

内容提要: 本文以博物馆革命文物搜集与研究为出发点, 对其物证特质进行分析, 深入探讨革命文物收藏与质量问题。以革命文物搜集为例, 分析目前博物馆、纪念馆在文物征集、研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提出革命文物内涵的挖掘与潜能释放的解决办法, 以体现革命文物的情感特征。并借鉴苏东海先生关于革命文物研究的思想, 探讨目前博物馆、纪念馆在革命文物征集和内涵挖掘等方面应采取的态度。

关键词: 革命文物 红色文化物证 精神财富 内涵挖掘 潜能释放 情感特征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in museum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alyzes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material evidence, and probes into the accumulation and quality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Taking the collec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of cultural relics in museums and memorial halls. Then, it puts forward solutions to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nd release their potentials, so as to reflect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It also draws on Mr. Su Donghai's thoughts on the study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nd discusses the attitudes that museums and memorial halls should adopt in the collection and excav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Key Words: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red cultural material evidence; spiritual wealth; connotation excavation; potential releas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一、革命文物与红色文化遗产定义

本文首先需要明确两个基本概念,即革命文物和红色文化遗产。关于革命文物的定义,2018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报送革命文物名录的通知》中,对革命文物作出了相关规定。革命文物主要指见证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独立和争取人民自由的英勇斗争,见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荣历史,并经认定登记的实物遗存。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彰显革命精神、继承革命文化的实物遗存,也纳入革命文物范畴。革命文物,包括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和可移动革命文物。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是指各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文物和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部门登记公布、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可移动革命文物包括国有可移动革命文物和非国有可移动革命文物^[1]。关于红色文化遗产的定义,可参考魏子元的界定:红色文化遗产是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各界人民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共同创造的一种文化遗产,既包括革命、建设以来的遗物、遗址、遗迹、纪念碑、纪念地等物质性遗产,也包括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信仰、知识、精神、价值、道德等精神(非物质)遗产^[2]。

博物馆和纪念馆作为革命文物的收藏、研究、展示的公共服务机构,在从事这项工作的过程中,以红色主题展作为体现革命文物研究重点,宣传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产生的典型人物、事件和历史故事,对于继承发扬

中国人民革命传统、传播革命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至关重要。它是博物馆和纪念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工作,是其扩大知名度,提高社会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二、革命文物和红色文化遗产的物证特质

“博物馆物是博物馆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博物馆功能发生的根据,是博物馆价值的源泉,有什么样的物就有什么样的博物馆。博物馆的一切精神现象都是博物馆物质存在的反映。研究博物馆的物就是研究博物馆的核心要素,研究博物馆本质的核心”,这是中国博物馆学家苏东海先生对于博物馆物的定义^[3]。他认为博物馆一切功能的发生,一切工作的进行,都是以博物馆物为基础而发生的。以革命文物为主要收藏、研究、展示、教育为主体的博物馆和纪念馆,在革命文物工作中,对于其特征的认识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但基本的认识比较一致,可归纳如下特征。

1. 临场性特征

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与古代历史文化类博物馆不同,具有强烈的临场性特征。例如延安革命纪念馆,其特质便是以延安为纪念性环境,收藏、研究、展示和宣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延安和陕北十三年领导全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其收藏、研究的重点包括延安时期整风学习、窑洞生活、大生产运动等当时的珍贵文物、照片及文献资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记录着这段让中国人民铭刻于心的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也宣告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作出的重要贡献。该纪念馆在文物征集、研究、展览、社教等方面,集大量文物、文献、影像、图片及口述历史资料,通过研究成果转换成的展览,展览极具说服力。这两个例证说明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环境具有一定时期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发生地的临场性特征。这种临场性特征,为革命历史的还原提供了真实依据。它的意义在于非人为造景所能承载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故事的遗迹遗址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意义。它与特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相互依托,具有珍贵物证的作用。

2. 个性化特征

革命文物极具个性特征。这种个性源于革命历史发生过程中所具有的人物故事。因为革命文物发生的时代具有一定的近现代特点,比之古代历史更具备人物和事件的物证留存性,真实的

物证和古代发掘的考古集品,具有同样重要的历史物证价值。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生平陈列”展,作为人物类红色主题展览,汇聚了518件文物展品和600余幅历史图片,以雕塑、绘画、场景复原为辅助,并运用多媒体手段,全面地展示鲁迅一生的生活、工作与业绩(图1)。展厅一层中心展区的“什么是路”、“铁屋中的呐喊”、“麻木的看客”和“这样的战士”四个主题形象,为理解鲁迅思想提供启示,向观众展示鲁迅先生伟大而光辉的一生。展览所展示的珍贵文物,体现了鲁迅的生平与贡献。苏东海先生曾说:“一百个博物馆可以有不同,但一百个纪念馆应该



图1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生平陈列”展



图2 中国地质博物馆红色主题展展出的柴达木之宝

是一百个面孔、一百种色彩。”^[4]可见个性特征所遗留下来的文物,对于革命类博物馆和纪念馆,是非常重要的物证,尤其是人物类博物馆、纪念馆,精英型人物也决定了研究与展示的基调。

3. 纪念性特征

纪念性对于革命文物和红色文化遗产而言,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无论是近代历史阶段还是新中国成立期间红色历史人物和事件,都具备纪念性。而人物和事件留下的物证,承载着讲述故事的真实性意义。与学校教科书一样,博物馆必须在传播过程中确保知识的科学性和真实性。例如2022年中国地质博物馆所举办的红色主题展览“初心如磐 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地质矿产专题展”,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对地质事业的重视作为主线,体现了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新中国的地质矿产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展览以大量物证展示了这一史实(图2),足见地质博物馆在革命文物征集与研究方面,具有深厚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大量具有革命文物特征的展品,丰富而真实地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中国地矿事业的支持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

纪念性特征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它与公众的密切关系。公众性是所有博物馆和纪念馆的共同特征,并不仅限于革命类博物馆和纪念馆。但对于革命类博物馆和纪念馆而言,它的特殊性在于与时代接近的人物与事件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具有社会教育意义,它的现实性远大于其他类型的博物馆。例如鲁迅先生,虽然是一位历史人物,但鲁迅的精神具有当代意义,公众影响力也更大。

三、革命文物搜集与红色文化遗产内涵挖掘

对于博物馆而言,若无具有说服力的藏品,再好的主题展览也会显得苍白无力。而缺乏对革命文物与红色文化遗产内涵挖掘,未能形成红色主题藏品研究成果,就不可能产生有特色的红色主题展览。藏品沉睡中,展览只是一张白纸。在革命文物信息的挖掘中,征集人员、总账人员、保管人员、摄影人员、技术保护人员、研究人员、社教人员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接触藏品的过程中,与相关文物进行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角度发现历史留给我们的信息,包括口述历史资料信息。

革命文物搜集和红色文化遗产内涵挖掘非常重要。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全国各地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文化艺术机构,都策划了同一主题、不同角度的展览,庆祝党的百年华诞。红色主题展览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场围绕建党100周

年而开展的党史展览热潮。展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各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需求,也丰富了博物馆、纪念馆和美术馆在红色主题展方面的策展经验,提高了红色主题展览的水平。同时,博物馆也接受了一次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教育的洗礼。

在筹建中国共产党党史馆以及其他同类地域性革命类博物馆和纪念馆的过程中,最困难的事是红色文物的“贫困性”。大量的调集文物工作,体现了文物“贫困性”的程度。这种现象令革命类博物馆和纪念馆在筹办红色主题展览中,不得不采用复制品替代原物证,也不可避免地在革命类展览呈现出“同质化”大制作。文物“贫困性”现象,并不是短期内所能解决的。此现象的形成,根本原因在于博物馆对近现代文物尤其是革命文物的重视程度不够。在博物馆的基础职能中,收藏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与近现代文化物证具有同样价值。当博物馆大发展、博物馆数量猛增时,后建的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会出现藏品积累和藏品相对“贫困化”的情况。红色文化遗产消失得较快,如果不能及时搜集,就会造成在筹办展览时的“捉襟见肘”。在当下“为了明天收藏今天”的理念中,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革命文物的征集与保护的大形势下,许多博物馆都努力在改变这种现状,但在一个时期内依然要面对革命文物“贫困性”现象。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在革命文物征集、保管、研究等一系列基础工作中,文物工作者需要对革命文物和红色文化遗产在原始情感、藏品情感与展品情感三者之间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关于这一问题,苏东海先生在《博物馆情感初论》一文中有精到的论述^[5]。

2014年首都博物馆接受苏东海、王迪夫妇捐赠的百余件个人收藏品中,以物鉴史佐证了他们那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与近百年的生活掠影。其中有苏东海先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缴获的美式照相机等物证,其物证所承载的首先是苏先生人生经历中的原始情感。首都博物馆征集人员在苏先生和王迪女士的带领下,进行了物证信息全流程的采集工作,包括捐赠文物造册登记、文物背后故事采访、口述历史记录等录音录像拍照等工作。整个征集过程充满了老一辈博物馆专家对后辈的专业培育与期望。2015年,官布、萨云夫妇捐赠给首都博物馆大型油画《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百件画作。在接收这批画作的过程中,萨老师不顾耄耋之年的身体状况,坚持按照首都博物馆征集工作的要求,翻阅寻找并提供了捐赠作品最专业、最倾注情感的原始资料整理与记录,与捐赠品一同无偿交给首都博物馆,其中包括官布先生创作《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初稿及创作历程中与当年受伤后仍住在医院里的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的通信和速写等,为首都博物馆下一步研究这幅影响了一代人的作品提供了全套的原始资料。可见,对于革命文物征集过程中原始信息的搜集与整理,完整保护其价值是最宝贵的经验。

深入挖掘藏品原始情感价值和流传经过,是革命文物搜集工作最具源头性、也是最专业的工作。如果在此时丧失了原始信息,在入藏博物馆之后的建档过程中,将无法寻其原始情感的踪迹,而博物馆藏品情感的源头在于其原始情感的捕捉到位。同时,它直接影响到展览情感的表达。而一件革命文物从原始情感、藏品情感到展览情感这一文物故事链条的释放中,涉及到博物馆社会情感与社会责任的感召与宣传,更涉及到博物馆意义的价值体现。如果展览情感不是藏品情感固有的内涵,或者不是原始情感的延伸,那就失去了原有情感价值。在向公众传达爱国主义情怀中,必然会大打折扣。

四、革命文物与红色文化遗产的潜能释放

在文物搜集与保护过程中,革命文物和红色文化遗产的潜能,已通过原始信息的采集具备了藏品研究的基础。而要让这些革命文物和红色文化遗产的价值得以释放并公布于众,首先应从研究文物入手。2022年8月国际博物馆协会发布了博物馆新定义: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它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

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会各界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6]。博物馆新定义突出了博物馆“研究”职能,并把它放在了第一位。博物馆定义修改永远不能概括博物馆发展的全部,但强调“研究”对于博物馆的重要性,体现了当下博物馆在基础研究方面的迫切性。这实际上在提醒博物馆人,一个没有扎实文物研究的博物馆,又如何能够推出具有影响力的展览奉献给公众?“研究是科学活动不是文学活动。”^[7]

革命文物与红色文化遗产的潜能释放,在博物馆和纪念馆是以展览为载体的。当前革命类主题展览体现博物馆的策划,最大的挑战是研究成果。没有对藏品深入的研究,根本不可能挖掘并释放文物潜在信息。这对于博物馆策展团队是一种政治洗礼与专业考量。从政治角度衡量,是否敏锐地紧跟时代脉搏而前行,策划出符合国家大政方针和时代主旋律的红色主题展览,能够检验一个博物馆领导班子和业务队伍在展览方面的大局意识。而从专业角度衡量,一个好的展览,如同一本好书。展览源于学术研究成果的转化,包括社教活动、讲解导览、学术讲座、宣传广告及文创产

品等项目,必须基于研究成果产生的展览大纲,展览的策划体现展览团队把握展览大纲主题的专业能力。

革命类展览的艺术呈现,同样要基于对展览内容的深度理解与艺术表达。红色主题展览的艺术呈现在博物馆各类展览中是一个难题,其难点在于如何将主题的政治性与展览的艺术性结合得恰到好处。以展览形式设计中的色彩使用为例,爱娃·海勒(Eva Heller)在《色彩的性格——色彩心理 色彩象征 色彩构思》书提到:“存在于不同文化中的不同生活方式决定了色彩效果的不同。在政治领域里色彩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红色是革命旗帜的颜色,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旗帜的基本色彩。”^[8]这在博物馆各类展览中都成为约定俗成的惯例。但是,红色主题展有许多不同的专题,都盲目简单使用同一款红色,使红色主题展览出现视觉疲劳。这是目前红色主题展“同质化”现象最严重之处。

在阐释一段历史的过程中,挖掘文物背后的多感观表达方式,也是当前革命类博物馆需要研究的内容。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所举办的“正义必胜 和平必胜 人民必胜——中国战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审判日本战犯史实展”,荣获第十四届(2016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该展在展厅现场设计了现场小提琴演奏,所演曲目来自当年谱曲的文物,这一真实场景的感染力,胜过千言万语,令人震撼。

总之,一个博物馆拥有丰富而有收藏价值的藏品,才能有生存的基础。一个展览有物可看,才能留住观众。博物馆、纪念馆广泛搜集革命文物并深入挖掘红色文化遗产的内涵,具有现实意义,也起到一定的抢救性保护作用。将革命文物和红色文化遗产当作时代的精神财富,转化为观众喜爱的好展览,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博物馆、纪念馆尚需努力。

参考文献

- [1] 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印发《关于报送革命文物名录的通知》[A/OL].(2018-10-18)[2022-10-23].http://www.ncha.gov.cn/art/2018/10/18/art_722_152209.html.
- [2] 魏子元.红色文化遗产的相关概念与类型,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20(1):12-16.
- [3] 苏东海.博物馆论[M]//苏东海.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卷2.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32.
- [4] 苏东海.我对纪念馆特征的概括[M]//苏东海.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卷2.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41.
- [5] 苏东海.博物馆情感初论[M]//苏东海.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卷3.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44-155.
- [6] 中国博物馆协会.国际博协特别全体大会通过新版博物馆定义[A/OL].(2022-8-25)[2022-10-23].<https://www.chinamuseum.org.cn/cma/detail.html?id=12&contentId=12403>.
- [7] 苏东海.苏东海思想自传[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136.
- [8] 爱娃·海勒.色彩的性格[M].吴彤,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